
宋庆龄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

尚明轩

宋庆龄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从少女时代发表宣传男女平等思想的《现代中国妇女》一文之后，研究妇女问题和进行妇女运动，就成为她一生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毕生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并为之呕心沥血，为中国妇女运动史谱写出不朽的篇章。本文仅就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贡献及其特点略作述论。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了神圣的全民族抗日战争阶段。时在上海的宋庆龄，目睹自己与全国人民盼望多年的全国抗战局面终于出现，无比激动和兴奋，积极地投身于妇女抗日救亡斗争中。

面对日军入侵造成的中华民族严重危机，宋庆龄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与挚友何香凝一道倡议建立上海妇女界抗日团体，准备最大限度地团结妇女界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挽救国家的危亡。经过她俩广泛号召、积极联络和紧张筹备，以原妇女救国运动领袖为核心，团结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夫人，以及各行各业的妇女界人物，于抗战爆发半个月后的7月22日就创建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援会”）。宋庆龄亲任理事。该会明确规定：“以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及战时负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

旨”，发动妇女“和男同胞们共赴国难”，“一致起来抗战”。^① 该会制定《简章》，发表《宣言》，计划团结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妇女，共同为拯救祖国而斗争。该会还分电各省妇女界成立各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希望把全国各妇女团体的抗日救亡力量统一起来。

“后援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它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出的重要果实。宋庆龄为捐弃前嫌、共同抗日树立了榜样。同年8月，以宋美龄为主席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并要求各地组织分会。宋庆龄与何香凝为保持和扩大统一战线，以利于团结各界的妇女，和利于抗日救亡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她俩提议，后援会理事会决议，将后援会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妇慰上海分会”），从属于南京妇慰总会，并向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登记备案，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在抗日救亡这一民族最高利益的大目标下，宋庆龄抛嫌释怨，以政治家的伟大力魄与宋霭龄、宋美龄从此结束因政见不同而长达12年之久的隔阂，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宋氏三姐妹的关系随即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她们于1940年春和1941年秋在香港公开联袂参加抗战筹款会议，又一道飞重庆视察妇女儿童及战灾救护工作，携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相互配合，彼此支持，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的妇慰上海分会，发展很快，到9月止，它下属的团体会员已有中华妇女互助会、中华职业妇女俱乐部、妇女运动促进会和妇女战地服务团等20多个，其中包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下的妇女团体。妇慰上海分会实际上成为当时上海妇女抗日救亡工作的总指挥部。各妇女团体还在浦东大厦设立联合办事处，以协调和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共同推动妇女救亡运动。她

^① 《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章》、《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宣言》，引自《纪念廖仲恺何香凝》（画册）第183、184幅，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们积极从事创建霞飞路、徐家汇等战地后方医院，抢救抗战伤员，还迅速举办妇女护士训练班，培训护理人员。训练班在两个月中就培训出 2000 名临时护士，先后分派到部队和后方医院服务。同时，各妇女团体大力开展募捐、慰问等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上海抗战。

尤为可贵的是，宋庆龄还亲自参加了妇女救亡的许多具体的实际工作。她不辞辛劳地挤出时间到处作抗日演讲，撰写救亡文章，口笔并用地呼吁妇女动员起来努力为抗战出钱出力，挽救民族的危亡。在一次给上海南洋女子中学的演讲中，宋庆龄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号召妇女们要爱国、爱人民，为祖国的抗战神圣大业贡献出一份力量。她那充满爱国热忱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广大师生的心，全校师生在校内外开展了为前线战士和难民同胞的募捐活动，短短几天中，就募得 1000 多件丝棉背心，送往前线和有关救济团体。^①

为使妇女界的救亡运动和其他各界开展的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宋庆龄和何香凝曾与文化界救亡团体等，联合举行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宣传活动，并率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募集 20 万双手套支援抗日战士的义举。在上海各个救亡团体冒着风雨出动 938 个宣传队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妇女界就出动了 600 多人，组成 100 多个宣传队。^②

宋庆龄还特别注意争取国际妇女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她经过多次与在沪的外国妇女联络，于同年 10 月间召开了中外妇女联合会议。美国妇女领袖史密司夫人及各国驻沪领事夫人等 76 人，与中国妇女界著名人士和代表 10 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各国妇女代表和妇女团体的名义，致电国联妇女和平会会长丁曼，“吁请布鲁塞尔各国代表以切实的办法，维持条约的尊严”，支援中

^① 吴若安：《宋庆龄同志对教育、妇女工作的亲切关怀》，《文汇报》1981 年 6 月 4 日。
^② 上海《救亡日报》1937 年 11 月 7 日。

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正义斗争。^①

抗战初期,宋庆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运用个人的特殊地位,在上海极力推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当时,出现了“许多妇女,工厂女工、交际妇女、女学生和女童子军,都并肩在火线上一起工作”的生动感人情景;妇女界确实总动员起来,真正做到了“千千万万妇女都出钱、出力或者既出钱又出力”。^②

(二)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随着战局的变化曾三度迁居,先居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又迁至重庆。其中居住香港的四年,是她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活跃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宋庆龄往返奔走于香港、广州之间,与广东和国际上的各妇女团体建立密切联系,促进了全国各妇女团体的工作及它们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开辟了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香港,宋庆龄利用该地的特殊政治环境,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呼吁国际援助中国抗战方面上。她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活动在外国朋友和香港各阶层人士之间,四处联络,各方协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她任主席的沟通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终于在1938年6月成立。在保盟这一抗日爱国组织内,宋庆龄专门设立了一个“妇女促进会”的机构,负责联络国内和国际的妇女团体,协助开展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妇女促进会通过对华侨妇女和各国妇女援华团体的联系,取

① 《妇女生活》,第3卷4期,1937年11月。

② 《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355页。

得了对中国妇女抗日运动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先后取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和夫人、菲律宾总督夫人等国际知名妇女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予的援助。还有不少国际妇女直接参加保盟工作，如司徒永觉夫人、克拉克夫人、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均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宋庆龄大力号召和领导全国的妇女同胞，积极响应法美两国“中国之友会”为帮助我国抗战所发起的义卖筹款活动，促使其获得圆满成功。

1938年7月，在宋庆龄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全国各党派的妇女团体代表在庐山举行会议。不同政治派别的妇女，团聚一堂，认真总结、研讨了战时妇女合作抗日工作，及今后妇运的方向和中心任务，并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该机构的工作，包括救助孤儿和受伤的军民，开展文娱活动慰劳前线军队，教育农村妇女，出版杂志，恢复和改良手工业方法和发展地方生产，以及训练这一切工作的干练的领袖与组织人员等。

宋庆龄赞扬这次会议“在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无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的讨论。在出席庐山会议的代表当中，有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象邓颖超就是一个”。^①她并明确认为，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妇女友好合作的基础”。^②

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各项工作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和发展，大大促进了全国妇女界各个团体间平等友好的合作，使妇女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也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救亡工作。

为了全面开展广东妇女救亡运动，宋庆龄经多方推动和联络，

^① 《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55页。

^② 同上，第359页。

于 1938 年 9 月在广州亲自召集广东女联会、省妇女抗敌会等十多个妇女团体，举行联合代表会议，成立了统一的“广东妇女抗敌工作协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协会名誉主席。该协会的成立，促进了广东妇女团体的大联合，为开拓广东妇女救亡运动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1938 年夏秋间华南局势危急时，宋庆龄多次到广州视察女壮丁队和各种救护队的训练情况，慰问伤兵难民，领导救护战灾妇女儿童工作，并发表言论，鼓舞士气，激励各阶层妇女们“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与敌殊死战”。^① 她还曾亲自参加广州人民反对侵略的火炬游行，同浩浩荡荡的男女同胞队伍一道前进。^② 爱泼斯坦称赞“她的精神和人民大众的精神融成了一体”。^③ 在一次与各妇女团体的代表讨论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募寒衣办法时，她发出“一个广东妇女捐制一件寒衣”的号召，并以身作则捐出 5000 元作为购置寒衣的费用。^④ 她的号召得到了广东各界妇女的积极响应，迅即掀起捐制棉衣运动热潮，短期内就顺利完成捐制 50 万件棉衣的任务。^⑤ 这些活动，确实“给广州这个城市带来了坚决的意志，并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诚”。^⑥

港澳地区的妇女运动，通过宋庆龄的积极领导和促进，也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香港中国妇女慰劳分会，1938 年间一次就捐款 29 万元，并有大批的药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⑦ 1939 年“三八”节，港九澳门的妇女近万人，举

① 《孙夫人在广州》，《中山日报》1938 年 8 月 23 日；另参见《新华日报》1938 年 8 月 26 日。

② 李洁之：《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广州日报》1981 年 6 月 4 日。

③ 爱泼斯坦：《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人物》1980 年第 3 期。

④ 《新华日报》，1938 年 8 月 22 日。

⑤ 《新华日报》，1938 年 10 月 11 日。

⑥ 爱泼斯坦：《回忆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中国福利会编《永远与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 页。

⑦ 《救亡日报》1938 年 4 月 30 日。

行了空前规模的纪念活动。宋庆龄分别参加了在香港利舞台和花园道举行的纪念大会和国际妇女节集会，并发表演说呼吁所有的妇女，不论她是何种国籍，不论种族和阶级，都应该站在前列来反对侵略战争，继续支持中国的抗战，援助在敌后战场上英勇战斗的游击队。她还在会上表彰了募捐活动中贡献出色的中国妇女慰劳会和香港中国妇女会等团体，赠送了“努力救国”的锦旗，以资鼓励。^① 在这次活动之后，港澳地区各妇女团体的征募捐献、慰劳救护、义卖、救济灾民等工作进一步得到深入的开展。

1941年底宋庆龄移居重庆后的岁月里，虽然环境复杂，她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动妇女运动工作。当时，她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动向，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以及各种有利条件，团结一批国内外朋友，继续推进保盟工作，与美国援华会、英国联合援华会等外国友好团体保持联系，争取国际社会援助。同时，她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妇女争取民主权利和抗日救亡的斗争。例如，她曾发表重要讲演和文章，反对专制独裁，呼吁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以争取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她多次发起影响颇大的救灾募捐活动，筹集救灾款项援助灾民等。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抗战时期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贡献是杰出而独特的。她为广泛发动中国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做了许多领导和组织工作，建树了光辉的业绩。正如当时舆论所赞誉，宋庆龄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坚决地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②

① 《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5—270页。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3日。

(三)

考察抗战时期宋庆龄从事妇女运动的言行活动，可以清晰地看出，它显示着三个基本特点。

其一，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

被压迫民族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被压迫妇女的解放。宋庆龄深切理解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密切相关的道理。她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在抗战时期发表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几篇专文里，宋庆龄一再阐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期盼妇女姐妹们把自身的解放与中国抗战结合起来。她说：“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现阶段的妇女解放和幸福，和中国、西班牙乃至一切被侵略民族的抗战的胜利，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① 她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全民族的解放，妇女的解放是谈不到的。”“所以妇女们应当怎样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②

正是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的思想出发，宋庆龄呼吁全国妇女在拯救祖国危亡的紧急关头动员起来，说服自己的丈夫、兄弟、儿子去服兵役，参加战地服务和后方生产，有钱者出钱购买公债，齐心协力进行保国卫土的战斗。她并勉励妇女们忘我地奋力救亡，以便“在将来抗战胜利的历史上替妇女争得极荣耀的一页”。^③

宋庆龄关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的思想由来已久。早

① 《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2页。

② 《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57页。

③ 《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57—258页。

在大革命时期，她在重要著作《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和《妇女与革命》等文中，就透彻地阐述过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即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并鼓励妇女不仅需要在小家庭中做一个“良母贤妻”，同时要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① 随着民族危亡日亟，她的这一观点更加深刻，从而在实践中把妇女运动同抗日救亡运动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其二，把争取妇女权益与妇女参与抗日救亡相联系。

宋庆龄认为，占全国人口半数的二万万妇女是抗日战争的一支庞大力量，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而为了推动妇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必须保障妇女的社会权益。

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出现“妇女回到厨房去”的腐朽滥调，许多部门还宣布不用女职员，妄图把妇女排除出抗日救亡斗争行列。针对这股歧视妇女、破坏妇运的逆流，宋庆龄挺身而出，于1942年夏疾书《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一方面要求妇女有同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却不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这种观点既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他坚决主张人人都有责任积极参加并改进政府的工作），也违背了中国所艰苦赢得的整个进步趋向。”^② 她通过大量史实，雄辩地论证妇女思想上解放与经济上、政治上的解放同样重要，坚决维护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正确路线，即广大妇女必须在革命斗争与生产斗争中，谋求自身的完全解放。宋庆龄激励全国妇女巩固已经取得的斗争成果，进一步在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新的斗争中争取得彻底解放。她一再强调，中国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的权利在内，最广泛地动员妇女的力量，组成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

其三，把妇女运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

^① 《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页。

^② 《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60页。

宋庆龄认为，“抗日战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妇女权利的战争”。^①因此，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是赢得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就是利用她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崇高声望，为完成联络世界和争取国际援助的使命而设立的机构。她所从事的妇女运动，同样也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的。

宋庆龄认为，“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是一个不可分的斗争”。^②她在1938年“三八”节为“纪念反压迫的国际妇女运动的伟大节日”所发表的文章中，强烈谴责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强调现阶段妇女的解放和幸福，与中国、西班牙乃至一切被侵略民族抗战胜利“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她说：在“全世界笼罩在疯狂的侵略者的毒焰里面”的情况下，“你们不要以为战争仅仅发生在世界上一个区域，昨天在西班牙，今天在中国，谁能保证明天这种死的恐怖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她明确宣告：“我们为着全人类的理性和幸福而战，为着全体女性的解放和自由而战。”^③她“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名义”，呼吁全世界的妇女援助中国，并号召广大妇女“和全世界被侵略的千万大众站在一起”，反对侵略战争，打倒法西斯侵略者，争取世界和平和全体女性的解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① 《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9页。

② 《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9页。

③ 《向全世界妇女申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1—222页。